

优入圣域

权力、信仰与正当性

黄进兴
著



中华书局

优入圣域

权力、信仰与正当性
(修订版)

黄进兴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黄进兴著. - 修订版. - 北京:中华书局,2010.3

ISBN 978 - 7 - 101 - 07118 - 4

I. 优… II. 黄… III. 儒家 - 文集 IV. B222.0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6015 号

书 名 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修订版)

著 者 黄进兴

责任编辑 王 芳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5¼ 插页 2 字数 380 千字

印 数 1 - 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7118 - 4

定 价 48.00 元

新版序

从 1981 年初次造访台北孔庙，至 2001 年旁及武庙而收笔，自己摸索孔庙文化整整二十年。

对这样一个“封建制度”，人们不禁浮起一个疑问：耗费如许时间是否值得？答案却是肯定的。就学术而言，确是丰富之旅。以今日的眼光回溯，重版《优入圣域》倘还有些许学术意义的话，大概是攸关“孔庙”的研究。它所彰显的“国家宗教”(state religion)的性格，别具意义。

过去数十年的宗教史与人类学都集中在“民间宗教”(popular religion)、“民俗信仰”(folk beliefs)或“原始宗教”(primitive religion)的研究，并且取得十分丰硕的成果。反观“国家宗教”或“帝国祭典”却乏人闻问，其原因存于传统社会里，“国家宗教”与政治脱离不了关系。因此一旦帝制崩解，作为“国家宗教”的孔庙祭典遂无所依托；而后尤受政治情势的拖累，人们视之为专制政体的文化象征，喻为万恶的渊薮。民初“打倒孔家店”的激情，以及“文革”“批孔”的浪潮，便是此一心结的表征。

然而时过境迁，今日我们可以用较超然的观点(detached view)，来审视儒教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文化意义。尤其在制度性的实践层次，孔

庙祭典确是极佳的具体指标。

要之，在帝制中国，孔庙祭典概由人君与士人统治阶层所垄断。它不但为官方所主导，并且展现“公共宗教”(public religion)的特质。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缘浸淫于西式“私人宗教”(private religion)的范式，反而习焉不察，无从捉摸其独特的宗教性格，从而判定儒教非为宗教^①。针对此一盲点，重启孔庙的探讨适可发掘历史的原貌，进而厘清传统中国信仰的多元面相。

唯拙作主要聚焦于上层政治与文化力量的较劲，较少顾及地方的特色。其实，各处孔庙的状态均略有出入。譬如，南京孔庙，除了政教象征，环绕其间尚有商业聚落的现象；而台北孔庙，则由地方士绅集资兴建，成为民间修筑孔庙的特例。凡此，均难一概而论。

此外，孔庙的资料蕴藏有丰富的历史讯息，足可解答传统社会的诸多提问。举其例：山东曲阜档案已发表的文献，即载有清代的物价、文字狱，或者明代以降，中央政府与地方(曲阜一域)的互动、人君与自视“天下第一家”孔府的紧张性等等。

记得1995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孔庙研讨会，会场爆满，远远超过其所能容纳的人员，多数人竟只能席地而坐。与会学者从礼制、社会、思想、音乐、建筑各方面进行严肃的探讨，所有论文后来由哈佛大学出版社集结成册^②。近年，从历史学、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各领域出发，探讨孔庙文化更不在少数。简之，孔庙经历多年的冷漠，今日能重获青睐，何其有幸。这与传统孔庙“门前车马稀”，恰成鲜明的对比。

另外尚值一提的是，1994年拙作《孟子的“四端说”与“道德感说”》始揭孟子伦理与西方“道德感说”颇有相契之处。原初的做法只不过是项“思想的实验”(thought experiment)，拟举证西方18世纪的“道德感说”，较康德

① 详细论证请参阅拙作《圣贤与圣徒》(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② Thomas Wilson ed., *On Sacred Ground*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的伦理更契合儒家伦理,借此证明新儒家援康德入儒的局限^①。不意近日看到施若特教授(Michael Slote)也援引休谟(Hume)的“道德感说”(moral sentimentalism)疏通孟子伦理,图欲表彰“德性伦理”(virtue ethics)的特色^②。这令人惊奇万分,盖“闭门造车,出则合辙”,委实不易。而我自己则全然同意儒家伦理较接近“德性伦理”的类型,而不类康德的伦理(Kantian ethics)或效益论(consequentialism)者^③。

末了,感谢北京中华书局愿意再次为拙作刊行较为理想的读本,这种严谨的出版态度,令人敬佩。此次改版删除了原繁体字版的“附录”部分,另增录《荀子:孔庙从祀的缺席者?》和《以序为书:评介〈朱熹的历史世界〉》二文,希冀较贴近原书的意旨。

黄进兴

志于南港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2008年11月

① 拙作《孟子的“四端说”与“道德感说”》,原载《大陆杂志》,第88卷,第5期,1994年。

② Michael Slote, “The Mandate of Empathy”, “Virtue Ethics and Care Ethics” etc., delivered on October 17-22, 2008, at NCCU Humanities Center. 施若特(Michael Slote)近年以阐释与倡导“德性伦理”闻名于西方伦理学界。

③ 拙作《理学家的道德观》(2006),拟收入陈若水主编《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转型》(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原序：孔庙因缘

研究孔庙，纯出偶然，并无任何理论的预设。

1981年返台，携友人游孔子庙，始发觉孔庙门庭冷清，游客稀落，与隔街人群熙攘的道观相比，仿佛坐落在纯然不同的世界里。适感诧异之际，随步入侧居中庭的两庑，立时被众多乌黑的木主神牌所震慑住；稍后一股阴凉之气迎面袭来，只得踉跄而出。这个阴暗的意象从此烙印在我的脑海之中。

离庙之前，抱着满腔疑团，绕至“游客服务处”，希望从闲坐于此的二三老人探询究竟，结果“一问三不知”，徒然令人失望。

服务台的玻璃柜摆着红皮精装的套书，据说清人所撰，虽然有点陈旧，封面烫金的五个大字“文庙祀典考”，却依然耀眼夺目。询问之下，不愧为文化瑰宝，价钱是较昂贵，但为了向友人宣示“学问无价”，只好掏尽口袋，忍痛买了下来。临走，老人面带慈祥的微笑，免费送了我一张红色签条，上面印着夫子自道之辞：“好学敏以求之。”至今，仍然挂在我的研究室，时时慰勉自己“不知老之将至”。

1981年的初秋，回到哈佛，专心未完成的博士论文，无暇他顾。置于案头的《文庙祀典考》，每逢失眠的长夜，总遵循禅家的教诲——“时时勤拂拭，

莫使染尘埃”，拿起来清理一番。因此这部书永远一尘不染。偶尔翻阅，即有所得。

正式研究孔庙是1988年以后的事，那是我从新加坡回来的两三年后了。在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工作时，研究室与图书馆毗邻而居，常进去随意翻书，偶遇孔庙资料便如“他乡遇故知”，亲切异常。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发觉：孔庙作为国家祀典，恰是传统社会里文化与政治这两股力量彼此互动的绝佳例证；而作为世界性的历史宗教，它的独特性格亦引人入胜。此外，孔庙的从祀制复可反映儒家主流思想，透过对它详细的剖析，可以重窥历史上儒家学术的真实动向，以弥补坊间理解的不足。

研究孔庙的困难之处，首先必得处理庞杂的史料，居间真伪难辨，而古人著述虽多，但称得上学术研究的却极为罕见；因此凡事必得自己动手，既耗时且费力。尤其初步所得往往与古代礼学名家，诸如丘濬、阎若璩、秦蕙田有所抵触，益平添心理莫大的压力。是故，常怀着戒慎恐惧的心情，反复检证，以致进展极为缓慢。立论偶获证实，即有长夜将尽的欣喜。

在埋首孔庙故纸堆的三四年后，我下定决心前往孔庙发源地——山东曲阜，做实地考察。由于长期沉浸于孔庙文献之中，一至阙里所见所闻，虽不至于如数家珍，但似乎每件古迹都似曾相识，欲语还休。记忆里最深刻的，并非书中所称道的孔庙或孔府的复屋重檐，反倒是漫步于孔林之中，古意盎然，繁华尽去的感觉。尤其偶逢一位状颇自得的樵夫，扛着锄头，边走边唱着不知名的曲子，声透云霄，余音袅袅，甚有返璞归真的意味。

1992年9月，参观了阙里孔庙，顺道前往北京，察看国子监内的京师孔庙，果然政治气氛十分浓郁，毫无古趣可言。一墙之隔的“辟雍”，几乎已成了大杂院，环绕一周，即行匆匆离去。仿佛生命之中，未曾发生过这遭事。

次年5月，为了了解地方孔庙，再次前往大陆。上海附近的嘉定孔庙已改为“科举博物馆”，内容生动而有趣，甚能呈现古人科考的情状。

南京国子监孔庙，十足“后现代”，已被解构得体无完肤。正殿的孔子塑像移至中庭，任凭风吹雨打；取而代之的是“历代美女像”，包括了西施、貂

蝉、杨贵妃等。不知是否着眼商场卖点，或者突显“女性意识”，则无由判别；但对历史上的孔庙只容男性、不纳女性一事，无疑是绝大的反讽。

南京孔庙的两庑，摆设了电动的“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每逢象征古代“大合乐”的摇滚曲启动时，立即手舞足蹈，喧哗异常。北魏时期，有道诏书曾透露出当时孔庙遭受亵渎、鸠占鹊巢的景象。书中谴责道：

遂使女巫妖覡，遥进非礼，杀生鼓舞，倡优嫫狎，岂所以尊明神、敬圣道。（《魏书》卷七上）

不知是否即此之谓？千六百年前，西晋之乱，阙里被寇，庙貌荒残。有朝臣路经该处，目睹“孔庙庭宇倾顿，轨式颓弛”，感慨“万世宗匠忽焉沦废”，至不觉涕流。这种“悲凉”的情怀，不意于今重现。

时下“民粹”（populism）意识高涨，“民间宗教”与“民俗信仰”自是流行的热门话题。毋怪二者均成为中、西学术界的聚光点，反观官方的“国家宗教”却乏人问津，以致长久以来默默无闻。尤有甚者，经过“五四”反孔洗礼的时代，无不对儒教为之侧目，甚至以祛除象征封建遗制的孔庙而后快。1917年元旦，陈独秀振臂急呼：

应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

其激昂之态度，绝不下于“文革”批孔的小将；因此今日人们漠视孔庙，只能算是内心对陈氏呼吁遥远的回音。孔庙，或其所象征的儒家文化落到今日之下场，恐是历代儒生所始料未及。

可是就宗教现象的本身而言，孔庙研究自有其理论的迫切性。它的祭祀历史绵延长达两千多年，唐代以下更遍布全中国；它积累了最丰富的材料，毋论就纵深或横面的向度均足以做极为完整的分析。这点是民间宗教难以望其项背的。因此在这个认识之下，我为孔庙研究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希望有兴趣的人可以省却爬梳资料之苦，而所有涉及解释性的问题当然都得留待时间的考验。

必须一提的是，我的研究之中鲜少着墨的，那就是从比较宗教的观点来

看，作为国家祀典的孔庙与民间宗教分属截然不同的信仰系统？或者二者在形成过程中，后者仅是前者的残型？甚或颠倒过来，以性质而言，后者方是前者的基型？拟解答上述问题，单靠孔庙研究是绝对无法成事的。这必得等待国家宗教与民间信仰同时累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方可相互比对、仔细剖析，从而在宗教理论方面有所建树。

总之，研究孔庙对我个人而言，是极佳的自我教育。漫长的摸索让我深深领略了解读中文资料的优先性，这在“观念暴虐”或“理论横行”的学风里，人们往往充耳不闻。不过我仍然愿意忠实地记下我内心的声音，以为治学见证。

在曲阜阙里漫步时，经过颜子庙，抬头望见牌坊的题辞“优入圣域”，感触极深。历史上这个词汇曾用来形容两个名人。首先是称赞颜回，于孔子之道独有体会，为他人所不及；其次用来指称王安石借政治权势，身后入祀孔廷。可是历史所未曾记载的是，我茫茫然闯进这个领域，结下这些文字因缘，以供同好茶余饭后佐谈。

最后，我想把这本小书献给

余英时教授与

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教授

在哈佛求学期间，他们对我的教导与鼓励，使我深深感受到人性的温馨。在他们心目之中，我永远是“既早熟又不成熟”的学生。

黄进兴

志于南港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94年7月

目 录

新版序/1

原序：孔庙因缘/1

壹 个人观点

一、所谓“道德自主性”：以西方观念解释中国思想之限制的例证/3

二、“道德自主性”与“责任伦理”：康德与韦伯的分歧点/21

三、孟子的“四端说”与“道德感说”/27

四、十年之后：后记/35

五、韦伯论中国的宗教：一个“比较研究”的典范/39

六、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迷思或事实？/65

贰 皇帝、儒生与孔庙

七、清初政权意识形态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统观/75

八、道统与治统之间：从明嘉靖九年(1530)孔庙改制论皇权与祭祀礼仪/107

九、权力与信仰：孔庙祭祀制度的形成/139

十、学术与信仰：论孔庙从祀制与儒家道统意识/185

十一、孔庙的解构与重组：转化传统文化所衍生的困境/261

叁 理学、考据学与政治

十二、“朱陆异同”：一个哲学诠释(池胜昌译)/275

十三、理学、考据学与政治：以《大学》改本的发展为例证/295

十四、“学案”体裁产生的思想背景：从李绂的《陆子学谱》谈起/329

十五、“学案”体裁补论/355

肆 附录

十六、荀子：孔庙从祀的缺席者？/365

十七、以序为书：评介《朱熹的历史世界》/385



壹

个人观点



—

所谓“道德自主性”：

以西方观念解释中国思想之限制的例证

“道德自主性”(moral autonomy)为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伦理哲学的原则。康氏思想传入中国源于清末中国知识分子由于内忧外患的逼迫,不得不向西方寻求“真理”;了解西方文化,尤其是近代西方文化的根源,对中国人而言,原带有极功利的企图,即对“富强”的追求。随着时势之推移,他们从器物、制度的学习,进而接触西方的学术与思想,谓后者方为西方富强动力之所在。在此一层面,某些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努力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外,并转而借之以重新理解、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康德哲学之引进即可作为此一现象之例证。

康德位居开创近代西方哲学的枢纽地位,其受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当属意料中事。自清末以降,其思想传进中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康有为首开风气之先,介绍康氏的“星云说”,继之有严复、章太炎之评述“不可知论”,至梁启超在1903年《新民丛报》连续数期介绍康德之生平与思想,谓“德国之哲学,为今世欧洲之最有力者”^①,其中尤以康德哲学唤醒德意志民族之自觉力为著,因此,推论“有康德然后有今之德意志”^②,又说康德在思想上巨大的贡献,使康德成为“非德国人而世界之人”,“非十八世纪之人,而百世之人”,甚至赞誉康氏至于“百世之师”,“黑暗时代之救世主”^③。从梁氏如许推崇,可以得知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康德的思想俨然据有一席之地,殆无疑问。

然而此一阶段对康氏思想之介绍只是零星片段,难免失之浮光掠影,譬如曾经四次苦读康氏著作的王国维就曾讥评梁启超说:

如新民丛报中之汗德(即康德)哲学,其纰缪十且八九也^④。

王国维之评语固然持之有故,但似乎缺乏“同情的了解”。就梁氏等而言,接触如此陌生的西方哲学,在概念、思想模式与语言表达上的困难,实所在多

^① 梁启超《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见《饮冰室文集》(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8),第三册,文集之十三,页49。

^② 梁启超《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见《饮冰室文集》,页49。

^③ 梁启超《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见《饮冰室文集》,页49—50。

^④ 王国维《王观堂先生全集》,第五册,《静安文集》,页1737。

有。他们以佛学名词如“真如”、“无明”比附康氏的哲学观念，正反映了当时中国语文在语言及概念两个层次皆不足以介绍陌生的思想体系。但此种缺陷，并没有阻挠梁氏想会通王阳明“良知说”与康德伦理思想的尝试^①。这正是上述我们所说中国知识分子接触西方文化的第二个目的。以王国维而言，其自身亦借康德哲学来分疏、评估中国哲学，他的“论性”^②、“释理”^③、“原命”^④都曾以康德的哲学来疏解中国传统哲学的命题。在“论性”一文中，他甚至以康德的观点来驳斥中国传统人性论的缺失，他认为“性之为物，超乎吾人知识之外”，因此中国古人论性之说无不自相矛盾，他说：

至执性善、性恶一元论者（笔者注：此指孟子、荀子等），当其就性言性时，以性为吾人不可经验之一物，（故）皆得而持其说，然欲以之说明经验或应用于修身之事业，则矛盾即随之而起，余故表而出之，使后之学者勿徒为此无益之议论也^⑤。

上述引言实带有康德驳斥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之谬误的基本精神，所不同仅是王国维把矛头指向中国传统的“人性论”而已。

王国维之后，介绍康德仍不乏其人，譬如蔡元培、张铭鼎、瞿世英、洪谦、贺麟等等，每个人强调的重点略有不同，虽具片面性，总和而言，康德的认识论、道德哲学、美学却大略都碰到了^⑥。1949年以后，虽有李泽厚等介绍康德，但已属凤毛麟角，思想上难起作用^⑦。在港、台虽有较大的思想自由，但在介绍西方

① 梁启超《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见《饮冰室文集》，页62—63。并见其《新民说》，第十八节，收入《饮冰室文集》，第三册。

② 王国维《静安文集》，页1549—1570。

③ 王国维《静安文集》，页1570—1596。

④ 王国维《王观堂先生全集》，第五册，《静安文集续编》，页1787—1795。

⑤ 王国维《静安文集》，页1570。

⑥ 1950年以前康德学说在中国传播的概况可参阅贺麟《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中国哲学》，第2辑，页343—387。

⑦ 这从李泽厚在他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的《后记》可以得知；他感叹：“国内多年来没有专讲康德哲学的书。”北京，1979年，页423。